

古典小说的现代解读与文化反思

——以《三国演义》为例

谭邦和

文华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本文基于“研究古典文学、反思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明”的治学宗旨，通过梳理学术使命、文本解读与文化逻辑的三重维度，系统分析了古典小说研究与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章认为，古典小说的现代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学术职责上，强调研究者应具备介入现实的终极关怀，打破对经典的盲目仰视；其次，在文本重塑上，通过揭示《三国演义》等作品的“群体创作”属性，解构其被神圣化的通俗价值，反思国民意识在长期传播中形成的滞后性；最后，在文化逻辑上，深度剖析了传统语境下“道德压迫智慧”的畸形机制，并以诸葛亮式的“服从标本”为例，探讨了专制文化对民族智慧发展的长期钳制。透过这一学术反思，可发现古典小说评价体系从“娱乐/考据”向“思想启蒙”的范式转换，为当下通过文学研究推动现代文明进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

【关键词】古典小说；现代解读；文化反思；文明建设

【收稿日期】2026年1月6日

【出刊日期】2026年2月8日

【DOI】10.12208/j.ssr.20260069

Modern 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al Reflection on Classical Novels: Through the Prism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anghe Tan

Wenhua College, Wuhan, Hubei

【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academic mission of "stud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reflecting o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modern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tudy of classical fi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academic mandate, textual d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logic. The article posits that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classical fiction is manifested in three primary aspects. First, regarding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it emphasizes that researchers must possess an ultimate concern for contemporary reality and dismantle the uncritical veneration of classical canons. Second, through textual reshaping, it unveils the "collective authorship" attribute of masterpieces such as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reby deconstructing their sacralized popular value and critiquing the lag i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ormed during their protracted dissemination. Finally, in terms of cultural logic, the article provide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aberrant mechanism of "morality suppressing wisdom" within traditional contexts. Using Zhuge Liang as a "specimen of obedience," it explores the long-term constraints imposed by autocratic culture on the growth of national intellect. Through this academic reflection, a paradigmatic shift in the evaluative system of classical fiction—from "entertainment and textual criticism" toward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is identified, offer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empirical insights for advancing modern civilization through literary scholarship.

【Keywords】 Classical fiction; Modern interpretation; Cultural reflection;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古典小说的现代解读与文化反思，这个题目比较大，涉及的作品比较多，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多。古典小

作者简介：谭邦和，文华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华学院湖北省非遗研究中心、湖北品牌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说作为我们民族过去的文学经典，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古典小说从它产生以来，它的形成过程、传播过程，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我们有时要回到一些原初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是文学？为什么有些人在弄文学？比方说，什么是古典文学？为什么要有一些人研究古典文学？

在八十年代，中国学术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我就曾经问过自己：现代餐桌为什么要给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摆一副碗筷？社会生活中，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什么要养活一批在故纸堆里工作的人？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改成：古典文学的研究、古典小说的研究，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它的意义是什么？^[1]我觉得学术界不太愿意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对一位身居高位的作家提出问题：“文学是什么？你为什么搞文学？”他可能不屑于回答，觉得你很幼稚。如果我们去问一些学有所成、甚且学术地位很高的人：“你为什么研究古典文学？你为什么研究古典文学成就很高，就在当下的生活里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也可能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认为这是外行在说话。

其实在我看来，每一个搞文学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回答这些问题，而且首先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认识。如果没有把这个认识搞清楚，你研究文学、研究古典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可以说，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没有给现代社会贡献思维成果，并以此来促进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么古典文学工作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是，文学研究的人、古典文学研究的人，都应该有个终极关怀，不是说我们从事文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工作，都要直接地跟当下的生活发生联系，而是讲我们的文学研究、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它整体上是一个系统，它的终端产品推向社会，应该要能够发挥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所以，我记得有一次讲座，主办方准备了一个签名簿，让我在上面写一段话，我想了想，就写了这样几行字：“研究古典文学，反思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明。”我觉得这是古典文学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我所奉行的学术理念。如果说研究古典文学仅仅是我们的饭碗，我们应该羞于在现代餐桌上拿起碗筷。

应该从这样的治学理念出发来思考问题。当然，我并不反对——我倒是非常赞成我们文学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有很多学者去做那些基础的工作，比方说文献的工作、考证的工作、作家作品的整理等等这样

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工作，是为后边的工作打基础的，这些工作不等于就是全部的古典文学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不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终端产品。在扎实的文献学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要把思维推进到跟现代文明建设相联系的环节，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当下关注和终极关怀就应该体现出来。

《长江日报》有一个书友会，有一次他们请我做一个讲座，出的题目是“今人如何读古典”。因为《长江日报》第二天会把讲座的内容见报，所以他们把我的讲座整理出来，占了第二天《长江日报》一整版，还弄了一个很吓人的通栏标题，叫作《谭邦和：今人读古典，跪下去就没救了》^[2]。我看到以后，接受这个标题，因为我在讲座里就讲过那句话：“今人读古典，跪下去就没救了。”古典文学、古典小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流传到现在，它用来干什么的？文学是反映生活的，文学最最重要的职能，不是娱乐我们的生活，而是反思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文学失去了反思生活的内涵，这样的文学，它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不是说完全没有存在价值。

我曾多次去新加坡讲明清小说，有一年莱佛士初级学院请我讲金庸的《雪山飞狐》。因为新加坡的高中把《雪山飞狐》选做了课外教材，新加坡人做事很规范，他们觉得既然这部作品成了所有学生都要读的课外读物，就要请有关专家做一个基本解读。于是我去跟他们讲了一次《雪山飞狐》，但说老实话，我并不太喜欢武侠小说。所以我在讲座的结尾提醒老师和同学：“武侠小说，年轻人千万不要迷恋，读一两本就够了。”因为武侠小说最显著的功能是娱乐，它适合哪个人群读呢？适合像我这样老冉冉其将至也、渐渐没什么事儿的人。等我退休了，没什么追求了，我要消遣时光，而且要让自己每天都比较快乐，这个时候就可以天天读了。为什么？因为武侠小说在我看来，它在真、善、美三个方面所能发挥的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你在武侠小说里去找真，找得到吗？它没有直面生活。比方说《雪山飞狐》，就是当年李自成逃跑的一个传说，完全没影的一个传说，一编就成了一个武侠故事。善在武侠小说里，更多是概念化的东西，比方说忠、义、仁、孝、节等等，都是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它没有直接的、真实的、复杂的生活，和现实很隔膜。至于美，也许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想象力了，完全无根的事情，能编出非常有趣的故事，确实很有魅力。如果我们生活里，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学术界要是把武侠小说抬高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像前些年据说孔庆东先生把金庸吹到了很高的位置，

这是让人很不可理解的。不是说武侠小说没有认识价值，而是说它的认识价值相对较低。所以小说如果只有娱乐功能，尽管这个娱乐很重要，这样的小说应该属于等而下之的。

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应该是让人读了以后掩卷沉思的作品，让人回头面对生活、面对现实，思考社会、反思历史。所以最好的小说，在我看来应该是悲剧，而不是喜剧。当然，喜剧可以有非常深厚的悲剧蕴含，这样的小说其实更让人悲哀。例如《儒林外史》。

我们由于在这样一些理念上并没有形成共识，所以我们的学术界所进行的研究，跟我们的生活是比较隔膜的，他们不屑于抬眼来看我们的当下。

因此，我们很多作品一直在被误读之中，我们根本就不去考虑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比方说《三国演义》，这部作品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的过程当中，发挥的是什么功能？很少有人去想。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有两种基本的创作方式。一种是“历时态群体创作”，一种是文人独立创作。《三国》《水浒》《西游》《说岳》《说唐》《杨家将》，以及后来那些公案小说、武侠小说属于前者。这类小说常常是一部作品没有一个作者拥有完整的署名权。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三国演义》这部作品，署名罗贯中，如果把稿费全部给罗贯中，罗贯中先生会觉得受之有愧。为什么？因为《三国演义》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实际上是群体创作，只是创作者分布在很长的不同时段，不是共时。它从历史出发，走进正史，走进民间，走向传说，走进说书场，走上戏曲舞台，成为三国戏，成为三国平话，在几百上千年中不同时期的作家艺人，以不同的文艺样式参与了三国故事的文艺创作，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本或素材，大约到元末明初出现了罗贯中这位大小小说家，他“据正史，采小说”，把三国故事改编成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所以像这样的作品，你能把著作权完全给一人吗？更要紧的是，你能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作者一人的吗？《水浒传》也是如此。水浒故事起点也是历史，宋江三十六人起义史书里有记载的，然后慢慢走进传说、走进说书场、走上戏曲舞台，成为水戏，成为水浒说书，然后再改编成长篇章回体小说。《西游记》也有类似的过程。这种成书过程，学界过去总结为“长期流传，一人写定”，后来也称“世代累积型作品”，我的《明清小说史》称为“历时态群体创作”。一部作品实际上的成书过程历时百千年，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群体意识都渗透其中了。

概言之，大约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武侠小说、公案小说等等，这样一些类型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群体创作，我把它叫做“历时态群体创作”。几百年，上千年，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文体，参与了某个题材的创作，而且成为一部名著以后，改编的历史还没有完结，每到一个新的时代，有了新的文体、有了新的艺术样式，就又会拿来改编，例如三国故事、水浒故事、西游故事现在有了电影、电视剧和网络传播。

这类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传播环境是公共场合，例如说书场、戏曲舞台，毋庸讳言，公共场合的文化传播，必然受到时代思想文化环境的制约，就像城市高架路的进口通常都有一个限高的横杆，超高了就上不去。也因为这个缘故，它们绝对不能代表那个时代那些真正的思想者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比方说我们把《三国演义》放到明代来看，《三国演义》的思想水平能够跟伟大的思想家李贽所达到的思想水准相提并论吗？李贽在思考什么问题？而《三国演义》在演说什么东西？它甚至还赶不上那些一般的文人——比较有思想个性、或者说有文学追求的文人在诗文作品里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平。很显然，历时态群体创作的小说作品的商业属性与大众传播环境，使其在思想高度上是无法与那些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作品相比拟的，因为《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作家生前都未能出版。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过去，也许由于比较特殊的原因，在现当代，我们比较多地给予了通俗文艺较多的赞美。我在这里不是要说我们的民众——我们过去叫群众——的思想水平不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特定的、受到制约的文化环境里，我们表达出来的思想，远远低于我们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在说书场里长起来的东西，远远赶不上一个读书人、一个思想者在自己的书斋里非常痛苦地思索的那些东西。这个道理其实应该很容易认定的，可是我们过去却给《三国》《水浒》这样一些作品太多的赞美，或者说没有去想过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我们的思想，长期保持着跟《三国》《水浒》一个水平。一说起《三国》《水浒》这样一些作品，我们的思想水平就回到了产生《三国》《水浒》这些作品的那个时代，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认同。《三国》《水浒》一直在传播，我们中国的听众一直在接受这些作品的思想观念，千百年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一直还保持着《三国》《水浒》的模样，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有时刚刚出现了一点进步，马上

又开了倒车。所以网上有一个段子笑话，说我们刚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正想爬起来，却发现历史的车轮又在倒车，很悲哀的事情啊。

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学生参加高考，写了一篇《赤兔之死》。当时大家都很惊讶，觉得这个学生太了不起了，他居然能够对《三国演义》如此熟悉，而且能够模仿《三国演义》那种半文半白的语言来写一篇高考作文，于是就给了他满分。作为文学名著，作为文学经典，《三国》《水浒》受到了敬仰和崇拜。在这块土地上，今人对于过去的文学经典是什么态度？是仰视，是崇拜，却无反思。这就是我在那次讲座里头说“今人读古典，跪下去就没救了”的原因。我们只要一说“哇，那是经典”，立即主动放下了自己的思想。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倾向？

历史演进了几千年，《三国演义》出现以后又过了几百年，我们的生活什么样子？还一直是那个状态。普通人满足于、永远满足于做剧场的观众和说书场的听众，很少想到要去参与社会的变革、进步和发展。就像《东坡志林》里讲的那个小故事：家里有个小孩调皮，家长给他几个钱，让他别在家捣乱了，到说书场听故事去。结果小孩到了说书场，正在“说三分”，听到刘玄德失败了，听众就悲伤、流泪；听到曹操被打败了，大家就欢呼、鼓掌^[3]。这是苏东坡时代说书场的情景，上千年了，我们的读者受众有改变吗？我们现在的说书场、剧场，还有电视机前坐着的我们的家人，有改变吗？还有，我们的研究者们有改变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我们仍然在欣赏那些以这种观念创作出来的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例如二月河创作的那些清宫题材小说，又被插上电视剧的翅膀，飞向了千家万户。《康熙大帝》的主题歌飘荡在大街小巷，其中有一句最让人震撼，我们的歌唱者满腔热情地为康熙抒豪情：“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想一想，如果康熙再活五百年，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不久又是《大秦帝国》电视剧的热播。这部剧根据小说改编，作者花了很多年时间研究秦始皇，然后形成了这样一种理念：他认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最伟大的政治家，而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秦朝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前景就是回到秦朝，回到秦始皇时代。而且他还提出一个理念，叫“强势生存”，这应该是从秦始皇的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吧？秦灭六国，屠戮天下，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成为始皇帝，那就是“强势生存”。然而“强势生存”的理念是现代文明吗？我们找几个“强势生存”的

例子出来看看，最容易找到的应该是希特勒，他就是“强势生存”，对不对？希特勒想把地球都变成他一个人的。再找个例子，可能就是日本天皇，东条英机也是“强势生存”。“强势生存”跟人类多元共存的现代文明理念相差万里啊！可是这位研究秦始皇的作家，却对他充满了赞美，在他的作品里表达了恨不得中国立刻回到秦朝的急迫心情，恨不得把秦始皇拉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来，让他重新做我们的君主。

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我在他的文章后面留了个言，大意说，你想把秦始皇请到我们今天来，让他活到现在，那秦始皇需要多活多长时间呢？需要多活2222年。4个2，多2呀！他居然想把秦始皇请到我们今天来，这跟想让康熙再活五百年是一样的呀！很奇特，康熙如果再活五百年，将活到2222年，也是4个2！这些没良知的作家，他们面对历史题材，面对那些当年杀人放火的暴君，怎么那么有感情？《康熙大帝》的主题歌里，在“再活五百年”前面还有一句歌词，好像是“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对吧？这是在赞美吧？是不是很欣赏？哇，好了不起啊，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呐！可是我问你，你想回到他的铁蹄下面去吗？他“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时候，这块土地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呀！人口史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必将造成一次人口死亡的波峰浪谷，付出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口死亡的代价。你说这些作家是不是没有良知？

我们的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看来有一种基因病在遗传。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抗日神剧，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最后连广电部都觉得有点儿太不像话了。我们看到，我们的抗日题材电视连续剧，从起初的历史演义，渐渐变成了英雄传奇，再变成武侠小说，后来干脆变成神话小说了，裤裆藏雷，手抓子弹，手撕鬼子，刀枪不入了！如果当年日本人是那么容易被我们揉搓，我们为什么要蒙受那么长时间的苦难？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最要紧的是反思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堕落到那个境地，受人欺凌。可是我们在这些电视剧里能够看到这样的反思成果吗？据说有一个段子，说有一位日本人想到中国来凭吊一下当年日本鬼子死得最多的一个战场，这地方好像不好找，我们的导游不假思索地把他带去了一个地方——哪里呢？横店。那个地方到现在还在每天让成群成群的日本鬼子死去，据说有个群众演员一天“死”了八回，因为他扮演日本鬼子。

说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必须追问，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艺，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它们最实质性、最要

紧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应该反思，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的历史，然后把这些反思成果拿来改造我们的生活，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可是我们在这些作品里能够见到这些东西吗？见不到。

但我们平常并不细想这些，只满足于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里，往电视机跟前一坐，欣赏的都是这些东西。原因在哪里？后来我想，我们当下这些历史题材的大众文艺作品之所以是这么一种状况，是有病根的，它跟《三国》《水浒》这些古典小说的创作理念、创作过程、创作环境、传播环境是一脉相承的。

这类作品，我刚刚进入学术园地的時候，也曾经对它们充满了崇拜，觉得这些小说写得真好啊，《三国》《水浒》写得多好啊！随着现代文明理念的形成，中晚年以后，一边读这些作品，一边抬头看我们的生活，才明白这些作品并不是最好的东西，而且我们也一直在误读这些作品，使这些作品可能具有的认知价值没有被发掘出来，而真正值得推崇的应该是《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

渗透着文化病毒的古代作品，并非没有认知意义，关键是现代读者和研究者以什么观念去发现和解读。我讲《三国演义》，是有一种从思想观念上颠覆的想法的。实际上《三国演义》里有很多情节，我们都未能深刻地进行文化解读。这些作品，虽然我说它们的思想水准没有办法跟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相比，但不等于说这些作品没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是有的，不过要看我们怎么读。作为一段历史的文学书写，《三国演义》毕竟敷陈了相关的史实，而其落后的文化观念，则需要我们的批判性思维。

《三国演义》我们误读很多，例如“三顾茅庐”，我们过去一直读作求贤佳话。我问过很多青年人，他们在中小学的时候，老师讲“三顾茅庐”是怎么讲的，他们说多半都解读为一则求贤佳话。

我有几年在参加评审语文教材，有一次语文、历史和政治教材进行交叉评审，我看到一本政治教材里面用到了“三顾茅庐”的素材，而用以论证的政治概念，居然是“平等”。大家觉得荒唐吗？教材以“三顾茅庐”作为例证，来阐释“平等”。我对此提出了批评，后来还写了一篇《“三顾茅庐”读不出平等》的文章，发表在《语文建设》^[4]。我们回到作品的语境，一个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都濒临绝境的野心家，要去请一个人来挽救他的政治生命，也包括他的自然生命，因此他跑了三趟路，这是“平等”吗？这里头有“平等”吗？我找个人来救我，这表现了我对他的“平等”吗？

刘备当时就处于这种情况。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艰难窘迫，一直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狼狈逃窜，东奔西走。我们常常说吕布是“三姓家奴”，其实刘备投靠的人更多，吕布、曹操、袁绍他都曾依附，我们说吕布人格低劣，但对刘备就不这么想了，很奇怪。当时刘备栖身于刘表，由于不小心介入刘表传位家事，又酒后失言，差点要被暗害，幸得高人提醒，假装如厕，溜了出来，接着就被追赶，若非的卢马有神力，载他越过檀溪，这回性命就丢了。独立四望，路在何方？刘备就处于这种无所依附的境地。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来帮了他一阵，这个人叫徐庶，是《三国演义》谋士里很重要的一个人才。有了徐庶的帮助，刘备的形势立即大有改观，使他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三国之争，其实就是人才之争。大家都在争人才啊，曹操看到徐庶这个大人才被刘备得到了，不行，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徐庶的母亲扣做人质，逼迫徐庶来投奔，并且假冒徐庶母亲的笔迹写了一封书信。徐庶是个孝子，不得不离开刘备，投奔曹操。民间常把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设一谋，当作他的美德，我们的立场就很清楚了——一直站在刘备一方。可徐庶一走，刘备岂不又要回到之前的困境了吗？所以刘备非常着急。徐庶临走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说他比我厉害，所谓“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嘛，这个人才你得亲自登门去请。由此可见，诸葛亮是在刘备极其艰难的情境中出现的，这里哪有平等？哪有什么礼贤下士？哪是什么求贤若渴？是他要完蛋了，急需有人来帮忙啊！而且我们看到，儒道兼修、隐居田园的诸葛亮，过着“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那种自由的生活，并不急于要找一份工作。

徐庶去曹营之前，先到诸葛亮那里去了一趟。见到诸葛亮后，徐庶就把刘备即将来请他的消息告诉了诸葛亮。诸葛亮的反应是什么？他并没有说，哎呀，感谢老朋友给我找到了一个好工作，而且这个老板背景了得，是中山靖王之后，红色基因。相反，诸葛亮的反应是“作色而言曰：‘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拂袖而入。”直接变脸了——他们可是老朋友啊！哎，你这是把我当牛羊贡品拿去进贡啊！而徐庶也顿感自己境界太低，“满面羞惭，不辞而别”^[5]。这个情节告诉读者，有徐庶的登门相告，诸葛亮是知道刘备要来请他的。徐庶还希望诸葛亮不要推阻，辅佐刘备，可以一展平生大才。

接下来，“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开始了。一顾茅庐，诸葛亮不在。我们能简单理解为他只是偶然出游了吗？要是他对这份工作没有犹豫，满心愿意，像现在，找工作这么难，要是有人推荐你去大公司，老板还可能亲自

登门来请，你就算到了半夜12点也不敢关手机啊！可诸葛亮倒好，潇洒出游，让刘备一顾扑空。一顾不遇，刘备或许会有点沮丧吧，但仔细想想，一顾即遇，反非所望啊！大人才哪能这么容易就到手？不搞点感情投资怎么行？要是像张飞说的那么简单：“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6]可那捆来的诸葛亮能真心效力吗？所以一顾不遇，刘备内心反倒可能窃喜。

于是有了二顾，可二顾依然不遇。二顾茅庐，老天爷特别帮忙，来了一场大风雪，天寒地冻，朔风凛凛，道路更加难行，张飞很不耐烦，要回新野去避风雪，而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7]可见刘备深心，知道冒雪登门是老天爷给的感情投资的机会，正好利用。李国文《三国演义》评点本评到这里时，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他点评道：“这话说出口来，便是小人嘴脸。”^[8]深得我心。

一顾、二顾虽然不遇，但并非什么人都没见到，刘备依次见到了诸葛亮的的朋友和家人，想必这些信息都传到了诸葛亮耳朵里。到了三顾的时候，诸葛亮终于在在了，大概是被刘备的“殷勤之意”感动，有点动心了，但他还没最终下决心，大白天居然在屋里睡午觉。

刘关张三人来了，一打听，诸葛亮在家。刘备别提多高兴了。我去过南阳武侯祠，看到过一组蜡像，把刘关张静候诸葛亮睡午觉的情景用蜡像做了出来，栩栩如生：诸葛亮侧身向里躺在旧式木床上睡午觉，蚊帐斜挂，刘关张一字排开站在旁边，静候诸葛亮醒来。看着这组蜡像，我真想吹一口仙气让他们活过来，想知道他们心里都在想什么。

诸葛亮在想什么呢？他不是儒道兼修吗？道家的人生哲学追求自由，儒家的人生哲学则讲究事功，他此刻想必十分矛盾。一旦跟了刘备，那种“卧龙岗散淡的人”的生活肯定就过不成了。要知道，中国古典文学里，那种自由自在、回归自然的生活被描写得格外美好，那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啊！而不出山，一肚皮的谋略岂不浪费！诸葛亮要告别这样的生活，心里怎能不矛盾？人生即将迎来如此重大的变化，他还睡得着吗？应该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睡里梦里都在纠结“该不该出山”。我想，他心里大概在盘算：“刘备啊，你走吧。第一次来，我躲了；第二次你冒雪而来，我又不在；你没生气，还来第三次。这次来了，我故意睡午觉不理你，你要是觉得我不够礼貌，一怒之下回头走了，我这辈子就能继续过卧龙岗散淡的诗意人生。可你要是还不走，我可能只好醒过来跟你走了。”诸葛亮大概就是这样复杂的心

理活动吧。

再说说刘关张三人的反应。老二关羽，我们知道戏曲舞台上的他是一张大红脸，还从来轻易睁眼睛，性格非常沉静。他不像张飞那么冲动，大哥说这个人很重要，让咱们等着，那就等着吧。可张飞早就不耐烦了，他一开始就觉得应该“一条麻绳缚将来”，何必亲自登门，第二趟还冒着那么大的风雪，一个山野村夫，架子也太大了！咱们大哥什么身份，居然大白天睡午觉不起来迎接，于是“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云长再三劝住。”^[9]当然，这个莽汉还是没明白刘备“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的机心。

那刘备此刻是什么心态？他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此时的刘备，就如同一个猎人——不是那种打小鸡小兔的小猎人，而是要打江山做君主的大猎人。要创这样的大业，必须要有大人才辅佐，而诸葛亮就是这样“大家伙”。他不辞辛劳跑了三趟路，这一次终于把“大家伙”堵在了家里。我们想象一下猎人围猎的场景，大猎物已经被困住，马上就能收网，猎物即将束手就擒，猎人反倒不急于收网，可能会先好好欣赏一番：“这个大东西，终于落入我的网中了。”所以我想给刘备设计一句台词：“睡吧，好好睡吧，这是你最后一个午觉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诸葛亮醒来后，在刘备的软磨硬泡下，终究还是跟他走了，告别了“卧龙岗散淡的人”的生活，从此再也没睡过午觉了，而刘备却可以天天睡午觉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刘备跑了三趟路，诸葛亮还他一座锦绣江山，这辛苦赚了没有！可我们过去却一直把“三顾茅庐”解读为求才佳话，一直感动于“刘备礼贤下士”，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教材，居然还把它当成诠释“平等”的好例子，实在荒唐。

实际上，人们对三国故事、三国文化的肤浅解读远不止“三顾茅庐”这一处。

比方说，人们一提到诸葛亮，就会想到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在学习诸葛亮的这种“伟大精神”，但从来没人问：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了什么？我们为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代统治者推崇这种精神，就是希望我们不问目的，只一味效仿这种精神——要是所有人都永远保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状态，专制统治者该多快活啊！

其实，这八个字对诸葛亮来说，还委屈了他。“死而后已”的“已”，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结束”“罢

了”，更口语一点就是“算了”。意思仿佛是：“谁叫你为我跑了三趟路呢？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活着就为你干，死了就可以算了吧？”如果这样解读，诸葛亮的态度是消极的——活着献身刘备，死了一了百了，这是消极修辞啊！

其实诸葛亮的“伟大精神”远不止于此。我们要知道，他出山以后，就再也没睡过安稳觉，一直为刘备辛劳奔波。刘备死后，他六出祁山。要知道，六出祁山打的是一场军事学家都认定根本没有取胜可能的战争，可他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什么？为了践行对先祖遗愿的忠诚。可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还要长期作战，只会让西蜀百姓长期处于战乱，劳民伤财，蜀国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毕竟要养活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啊！据有关数据，平均每九人中就有一个士兵。

六出祁山百般辛劳，秋风五丈原，诸葛亮壮志未酬身先死。按前面的理解，如果他只是“死而后已”，那到这里也算是够了，但诸葛亮不是“死而后已”，而是“死而未已”。

我上大学时在露天电影场看过一部英国电影叫《红菱艳》，其创作灵感来自安徒生童话《红舞鞋》，电影里讲一位芭蕾舞女演员，她有一双有魔力的红舞鞋，一旦穿上就停不下来，会不由自主地一直舞蹈下去。我想，刘备“三顾茅庐”，就是给诸葛亮穿上了这样一双红舞鞋。如果是“死而后已”，诸葛亮应该把这双红舞鞋带进棺材里，可他没有。诸葛亮知道自己不行了，便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挑选接班人，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位几乎接近完美的接班人——姜维。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算不算称职？可见他挑选的接班人多靠谱。也就是说，诸葛亮把自己脚上的“红舞鞋”脱下来，给姜维穿上了，姜维穿上后便继续“舞蹈”，去代替诸葛亮完成所谓“先祖的遗愿”。所以，怎么能说诸葛亮是“死而后已”呢？这真是冤枉他了。

而在六出祁山和九伐中原的过程中，正如我刚才所说，打的都是根本没有取胜可能的战争，所以战事格外艰苦。诸葛亮和姜维带着蜀国士兵，连年在泥泞难行的蜀道上奔波，流血，牺牲。可后面那位傻瓜皇帝（刘后主），却并不领情。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德与智慧的相互关系，《三国演义》中最值得深思的，正是这一点。它客观上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德与智慧的畸形关系：在这种文化中，道德压迫智慧，智慧必须绝对服从道德的支配。

诸葛亮和刘后主这一对君臣，在中国君主专制制

度的历史上是一个完美的文化标本，一直被提倡、被赞美。为什么？因为这个标本告诉历代的民众和入朝为官者：即便君主是刘后主那样的傻瓜，即便臣子是诸葛亮那样的智者，你也应该像诸葛亮那样，绝无二心地服从。这样一对组合——傻瓜在上，智者在下，堪称君主专制制度“最好的状态”，是最鲜活的专制文化的标本。

也就是说，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好状态”，就是哪怕君主傻到刘后主的程度，臣子聪明到诸葛亮的地步，也必须维持既定关系，臣子要绝对服从君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发现了诸葛亮的核心存在意义——他是“服从的榜样”。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就是这样一个服从的标杆。

由此也能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到南阳旅游，南阳人会非常骄傲地向你介绍三位与当地有关联的历史文化名人——张衡、张仲景、诸葛亮。南阳人杰地灵，出过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但为何独把诸葛亮捧得最高？张衡据说发明了能预测地震的仪器，即便我们现在都无法精准预测地震，可在那个时代，能想到预测地震并制作出精美仪器，已然非常了不起。虽然原件没有流传下来，有人根据文字的描述制作的仪器不具备预测功能，但张衡可以作为古代科技的代表人物，称他一声“科圣”似不为过。张仲景写出了《伤寒论》，这部著作至今仍在指导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就像我们称杜甫为“诗圣”一样，认可他在医学领域的崇高地位，称他一声“医圣”也合情合理。这两个人是真正的南阳人，作为古代科技与医学的代表，理应受到我们的崇敬。但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据说80年代以前，张衡、张仲景的墓荒坟乱草，无人理睬；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宏伟庄严的武侯祠香火不断，备受尊崇。而且要知道，诸葛亮并不是南阳人，他只是在那里小住过一段时间，甚至连具体住在哪里都只是“据说”——湖北襄阳还一直在跟南阳争夺这个宝贵的文旅资源，南阳有武侯祠，襄阳有古隆中，也颇具规模。

不管争议如何，武侯祠被隆重庄严地修建起来，历代统治者不断投资，民间也有人愿意捐款。为什么真正本地人的科学家、医学家得不到足够尊敬，墓莹荒芜，而一位仅在当地短暂居住过的人，却能获得如此多的崇敬？修建武侯祠需要大量资金，没有钱根本建不起来，可超越朝代变更的历代统治者都愿意在这上面投资，却不愿给张衡、张仲景修建稍好一点的纪念建筑（不过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但我想他们得到的供奉可能仍赶不上武侯祠）。

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我曾经收集到一本名为

《诸葛亮与中国武侯祠》的小册子，此书详细介绍了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的诸葛亮墓葬祠庙与遗迹类建筑，给人的印象是，诸葛亮从出生到死亡，只要他生前脚尖沾过的土地，甚至只是据说沾过，后人都会修建一个纪念建筑。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我们供奉了很久的文化偶像，至今仍被供奉着。比如进入新世纪襄阳就新建了一个诸葛亮大广场，树立起一座巨大的诸葛亮铜雕，其文化理念是把襄阳打造成“智慧之城”。我并不反对修建这样一些纪念性的可以用于发展文旅的建筑，可我们想没想过：我们所推崇的智慧是什么智慧？这些智慧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些智慧用场在哪里？某年有个电视台邀请我参与一个跟诸葛亮相关的宣传拍摄活动，我婉拒了，因为我没想好，作为一个21世纪的读书人，对于诸葛亮这尊传统社会的文化偶像，我该说些什么。

我们为什么永远生活在三国故事三国文化的环境中走不出来？为什么永远都还是《东坡志林》里为刘备失败哭为曹操失败笑那样的听众和观众？诸葛亮作为文化偶像，说得好听点是“忠臣”，但一层层剥开这“忠诚”的外壳，核心是什么？核心是“服从”。我们崇拜诸葛亮，却从来没想过时代进入21世纪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崇拜他。在中国历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进程中，诸葛亮提出过什么先进思想？他对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有过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他毕竟只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君主专制文化的一个维护者。

不客气地说，诸葛亮的出山，在三国故事的语境中，其实就是挽救了一个行将灭亡的军阀。三国之争乃至此前的诸侯割据，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正义的——我们常说“春秋无义战”，三国时期难道有义战吗？诸葛亮帮助其中一方，有什么实质性的新东西吗？一位部队研究者从军事学和战争术的角度解读《三国演义》，总结出四个字：“兵不厌诈”，这很有道理。无论是军阀混战还是三国鼎足相争，大家都在使用诈术，其中毫无道德可言。诸葛亮也照样杀人放火，而且因为他更聪明，更善于用火。

要知道，那是冷兵器时代，没有大型杀伤型武器，要迅速改变战场局势，火攻往往就是最厉害的手段。诸葛亮的厉害之处就是善于火攻——这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大型杀伤性武器”。火攻能让敌军成片死亡，甚至整支军队都被烧死，他也因此屡获胜利。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诸葛亮派一支小队伍把敌军诱入山谷，敌军进来后，前方道路被堵，回头一看退路也被封死，山谷里到处都是柴草油车硫磺焰硝等易燃物，山上火种乱抛，乱石横木也滚滚而来，熊熊烈

焰瞬间吞噬一切。例如七擒孟获那一战，诸葛亮火烧三万藤甲军：“诸葛亮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孔明泣泪而叹曰：‘吾虽有功，必损寿矣！’这国之人，不曾走了一个。”总结这个战役时，诸葛亮也自言“大损阴德”，还承认此战“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类者，是吾身之大罪也！”^[10]放到今天，这叫“种族灭绝罪”。

诸葛亮心有仁慈，杀人太多，时常忍不住灵魂忏悔，“孔明秋夜祭泸水”那一段文字，写他祭奠万千战死亡灵之后，忍不住放声大哭^[11]。

中小学教师讲到三国历史或三国文化时，导语常常是“三国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其实三国时代是中国人一段非常悲惨的历史，各路军阀铁蹄践踏河山，战争导致巨量人口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中国人口史的一个谷底时期，但后来的作家们大多没想过这些，我们的读者、听众也没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国人总喜欢在历史悲剧面前狂欢、娱乐，把历史悲剧当成娱乐材料，从来没想过能不能终止那样的历史，能不能让老百姓长久地、永远地生活在和平之中。

我们过去没想过这些问题，只是津津乐道地读《三国》《水浒》，看电视剧，满足于做一个逆来顺受、接受现实的小民、草民，顶多在遭遇灾难时，希望鲁智深、武松这样的江湖义士突然出现在面前，却从没想过自己去改变现状。

在上文中我提到了中国人的智慧问题，中国人非常聪明，但我们的智慧一直没能很好地生长，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智慧上面总盖着一层“道德”，而这层道德又被历代统治者塞进了私货，变成了工具化的东西。工具化的道德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民族的智慧始终难以健康生长。

还是以《三国演义》为例：刘后主在后方吃喝玩乐，诸葛亮、姜维在前方艰苦作战、出生入死。有一次诸葛亮对阵狡猾的司马懿，好不容易打出战机，司马懿一看形势不利，急忙退兵，坚守不出，暗中却把失期受了诸葛亮责罚因而叛逃魏营的苟安派回成都，向宦官散布谣言，说诸葛亮倚功而有篡国之心，早晚会上造反称帝。刘后主这个“傻瓜脑袋”直线思考：“是啊，他长期在外，手握重兵，要是反了，我有什么办法？”你们觉得刘后主傻吗？其实他不傻，这个思维符合常识。可在“诸葛亮是绝无二心的忠臣”这个预设下，他就成了“傻瓜”。刘后主听信谗言，立即下了一道诏令，让诸

诸葛亮班师还朝。诸葛亮接到诏令后，陷入了道德与智慧不能兼顾的二难困境：用智慧思考，战机难得，应该继续作战、扩大战果；可君主的诏令，能不服从吗？道德与智慧在这里无法兼容，诸葛亮的选择是“服从”——接受诏令，立即班师还朝。两军对垒时退兵极为危险，他反用“增兵减灶”之计才平安退回成都。急急去见刘后主，诸葛亮问后主，我正准备出兵长安，陛下把我召回来有什么大事？刘后主无言以对，只好傻乎乎地说好久不见丞相了，好想念，别无他事。这简直是儿戏！这就是道德蹂躏智慧、傻瓜玩弄智者啊，诸葛亮心里能不流血吗？

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姜维九伐中原时，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他跟邓艾作战打出战机，邓艾见形势不利，故技重施，派奸细潜入成都，通过宦官进谗言，说姜维有怨气，将要叛变投魏。于是刘后主又下诏令宣姜维还朝，使姜维同样陷入道德与智慧不能兼容的二难困境，他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服从。毛本《三国演义》在这一回加了两句结诗：“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12]这两句诗加得好啊！我们读的是《三国演义》，可这两句诗却把战国乐毅、宋朝岳飞的故事串联了起来，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绝非孤例，而是在不断重演。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有一种办法可以战胜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国家——那就是利用离间计，借助君主专制国家“文臣武将必须绝对忠诚于君主”的文化，派奸细打入内部，散布谣言，或者通过君主身边的奸佞小人进谗言，让对方统治者相信手下的军队主帅要造反，于是自己把主帅召回甚至干掉。岳飞不就是这样被干掉的吗？他不也陷入了道德与智慧的二难困境吗？他不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吗？当12道金牌接连催促岳飞班师还朝，他选择了服从，一回去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天牢。为了表现忠诚，担心儿子、女婿造反，他还亲笔写信把他们招来一起坐牢，最后一同死在风波亭，抗金大业也随之烟消云散^[13]。

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的悲剧。道德与智慧的相互关系，是我们中国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教训深刻、影响深远，可我们至今仍很少觉悟。

参考文献

- [1] 闻涛.在历史反思中推进学科本体理论建设——建国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概述.文学遗产[J].1989.(04).本人与会并发言，会议综述以我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成果应能参与现代文明建设的观点作为青年学者的代表性意见.
- [2] 宋磊.谭邦和:今人读古典，“跪下去就没救了”[N].长江日报,2015.11.8.
- [3] 苏轼著,刘文忠评注.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4] 谭邦和.“三顾茅庐”里读不出平等.语文建设[J].2015.6.
- [5]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356.
- [6] 罗贯中著.谭邦和点校.三国演义[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7.172.174.
- [7] 罗贯中著.谭邦和点校.三国演义[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7.172.
- [8] 罗贯中著,李国文评点.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2.6.
- [9] 罗贯中著.谭邦和点校.三国演义[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7.174.
- [10]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872.873.
- [11]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876.
- [12] 罗贯中著,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
- [13] 钱彩.说岳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